

2 要当哥哥了

1993 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写和答辩，导师有意留我在组里做一段时期的博士后，继续与英国捷豹（Jaguar）汽车公司合作，完成车体造型的研究课题。那年十一月，我去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参加“工业和应用数学学会（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举办的计算数学会。我在会上发言的时候，有一位来自美国鹰图公司（Intergraph Corporation）的法籍软件高级工程师对我的课题很有兴趣。余下的几天里，我们常在一桌吃饭，用带浓重中国和法国口音的英语讨论计算几何问题。实在听不懂的时候，我们用笔和纸来交流。年会结束时，他对我说：“如果愿意来鹰图公司，请同我联系。”

回到英国不久，我又收到欧洲计算机图形学会的邀请，参加十二月在葡萄牙西南部阿尔加维（Algarve）举办的学术会。时值远翀的学校放寒假，我们决定全家一起去阿尔加维海滨开会和度假，并在那里庆祝晓鹰三十一岁的生日。阿尔加维的整个冬天气候温和，海水温暖而平静，是欧洲人冬天海滨度假的优选地之一。阿尔加维海岸有许多石灰岩层构成的系列溶洞，洞里各式各样的钟乳石和石笋极为壮观和美丽。开车沿海岸公路往西南一直到尽头，便到了欧洲大陆的天涯海角：圣文森特海角（St Vincent Cape）。1797 年，那里曾发生著名的圣文森特

海角战役。英国皇家海军在约翰·查维斯爵士（Sir John Jervis）指挥下，击败了规模更为庞大的西班牙舰队。

与英国潮湿阴冷的冬天相比，这里阳光明媚风和日丽。我开会时，晓鹰和远翀在海滨漫步、拾贝和玩水，傍晚母子俩去码头从出海归来的渔民那里买刚捕回的海鲜做晚餐。三天的会议结束后，我们租了一辆福特嘉年华（Fiesta）车，沿海岸开车自游，在阿尔加维度过了愉快的一周休假。

从阿尔加维回到英国后，晓鹰的生理周期推迟。我们去药店买了验孕试笔，测试结果显示“怀孕”。对许多只有一个孩子的英国父母来说，再次怀孕会让他们非常高兴。可我们一点也不高兴不起来，因为当时的中国实行严格的一胎制。我们的第一反映是“糟了，这可怎么办？”惊惶之余，我和晓鹰必须早日决定要不要第二个孩子。考虑到当时的学生身份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晓鹰很坚决地表示不能要第二个孩子。我虽然倾向于要这个孩子，却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服晓鹰。我们去校医院见妇科医生，请她推荐和联系能做引产手术的私人诊所。为了排除家用测试笔可能的误诊，医生给晓鹰又做了一次妊娠测试，结果证明晓鹰的确怀孕了。根据医生的推算，晓鹰应该是我们在阿尔加维海滨度假时怀的孕，预产期是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当我们告诉医生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和我们的打算后，她给我们介绍了一家做引产手术的私人诊所。临走时，这位好心的医生一再叮嘱我们多考虑几天，不要贸然做出决定。

通过校医的介绍，我们联系到了那家私人诊所，并预约好了手术的日子。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晓鹰做了个噩梦：医生取出还活着的婴孩，把他扔到垃圾桶里；孩子奇迹般地生存下来，到处寻找妈妈……晓鹰从梦中惊醒，伤心地哭了起来。哭过，她很坚定地表示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听她这样说，我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我心想：如果真有上帝的话，这个孩子

就是上帝保下来的。祈愿上帝继续保佑他健康和幸福！

接下来要做的事便是用适当的方式告诉远翀妈妈怀孕要生小宝宝的消息。我们住的家眷公寓区里有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家庭。尽管远翀每天都有一帮小伙伴一起玩，但当我们问他想不想要一个弟弟跟他玩时，八岁的儿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好啊！”我们又问：“如果是妹妹，要不要？”他也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我们告诉他：“弟弟或妹妹会争你的玩具噢。”他非常大气地说：“没关系，我把玩具都给他。”当知道妈妈确实怀了小宝宝后，翀翀好些天都不断地问妈妈：“是弟弟还是妹妹呢？什么时候才出来啊？”

决定要第二个孩子后，我和晓鹰开始郑重考虑是回国到高校教书，还是留在西方工作。最终，我们决定先在西方工作几年。曾资助我做博士研究的捷豹汽车公司年初刚与导师的课题组续签了三年的研究项目，所以导师希望我能留在组里继续做博士后研究，而我自己则希望找一个比较稳定和长久的工作。基于此，我给在美国认识的鹰图公司法籍高工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有意到鹰图公司工作。1994年3月，这位高工专程飞到伯明翰，对我进行正式考核和面谈。他是法国人，在法国名校取得数学硕士和应用物理博士，毕业后在鹰图等多家软件公司干了十多年，是一位很有能力的软件工程师。他的英语带很浓重的法国口音，而我又带很重的中国南方口音，面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能靠书写交流。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交谈，他表示对我受的教育和具备的能力非常满意，准备回美国后就着手为我办理审批和签证事宜。

为感谢鹰图公司的高工专程来英国面试我，我请他到家里吃饭。如同许多学工程的人一样，我既不谙世事又不擅长人际交往。从高工住的酒店出来，我本应叫个出租车，但却习惯成自然地带着鹰图公司的高工搭乘公交车去学校家眷公寓区。事

后每当同家人和朋友谈及此事，大家都忍不住捧腹大笑，说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这位高工回美国后，雷厉风行地为我办理工作事宜。四月我便收到了鹰图公司的聘书和申请美国签证所需要的材料，鹰图公司希望我在六月的毕业典礼结束后，就去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的总部上班。

晓鹰怀远时，除了怀孕初期出现过晨起呕吐外，没有其他不适。但这次怀孕反应特别厉害，虽然没有恶心呕吐，但是她经常感到气紧头昏，有时走在路上，会突然觉得心跳加速和气紧，不得不找个地方坐下来。有一天晓鹰在公司上班时，突然眼睛发黑，感觉天旋地转，要不是及时扶着墙，她肯定会倒在地上。同事看见后，赶快上前扶她坐下，稍后又开车送她回学生宿舍休息。我从学校赶回来，带她去伯明翰大学附属的伊丽莎白医院检查。医生对晓鹰进行了全面检查，认为晓鹰和孩子都正常，只是妊娠反应严重。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医生让晓鹰每天带上心脏检测器观测一周，检查结果仍然是正常。

在英国合法居住半年以上的人都能享受免费医保，所以医保和就医对我们来说不是个问题。为了便于检查，晓鹰在附近的伯明翰大学伊丽莎白医院注册，定期去那里做孕妇和胎儿的常规检查。当怀孕五个月做超声波检查时，我们俩想知道胎儿的性别。考虑到西方报纸经常披露中国父母丢弃女婴的事件，我们在问及胎儿性别之前，主动告诉护士我们已有一个男孩，所以这个孩子是男是女都高兴。尽管如此，护士还是以胎儿太小看不清楚为借口，没有告诉我们。也许她听多了中国人有重男轻女情结的报道，不敢告诉我们这次怀的是女孩。

转眼就到了六月。我告诉了导师接受鹰图公司应聘的事，并说明我打算等六月中毕业典礼完毕后就去美国工作。导师和计算几何组的负责人博尔教授知道我决心已定，诚恳地告诉我，如果不喜欢美国，可以回到伯明翰大学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晓鹰也把将去美国的计划通知了她工作的公司，公司的同事为她办了婴儿洗礼（baby shower）和欢送会。公司的总工程师和人事部门对晓鹰四年来的工作非常满意，几周前曾透露准备提升她为电路设计工程师。知道晓鹰要离开公司后，总工程师为她写了一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希望她今后在美国找工作时用得上。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毕业典礼一结束就去美国。

我将去的鹰图公司数学组里有一位上海籍的女工程师，她毕业于复旦大学应用数学系，出国后又在美国的阿拉巴马大学取得数学硕士学位。当我们在伯明翰的家中与朋友开告别派对时，我接到这位女工程师的电话。自我介绍一番后，她把话题转到美国的医保上。来英国与我面谈的法国高工知道晓鹰有身孕，但他自己没结过婚，自然不关心家属和小孩医保的事。这位大陆去美且当妈妈不久的女工程师从法国高工那里知道晓鹰怀孕的事后，专门向鹰图公司的人事部门了解怀孕与医保的政策。美国的医疗保险在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加入医保前就已经存在的健康情况不受医疗保险保护。晓鹰怀孕是在鹰图公司为我们买医疗保险前就存在的事实，所以医疗保险不承担孕妇检查和接生的开支。得知这个情况后，她和法国高工建议晓鹰留在英国，生了孩子再来美国。如果晓鹰在英国生小孩，不仅免费，还可在生完孩子后领取两个月的工资。可是我们已卖掉所有的东西和退掉了住房，让晓鹰和儿子留在英国不太现实。咬咬牙，我们把两万多英镑的储蓄全换成美元，准备用来支付检查和生孩子的费用。从中国来英国时，我们“两袖清风”；现在最坏的结果不外乎是把这几年所有的积蓄用光，又像初来英国时一样，一切从零开始。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朋友们把我们送到伯明翰的长途汽车站。我们一家三口告别了这座生活了近六年的英国第二大城市，搭乘长途汽车去伦敦的希思罗机场。晓鹰当时有

李永明

近七个月的身孕，怕登机时遇上麻烦，因此随身带着医生同意旅行的证明及所有检查报告。在希思罗机场经过严格的移民审查后，我们一家搭乘英国航班，直飞美国北卡州的夏洛特·道格拉斯国际机场。